

BROWSE GLOBAL

点 击 世 界

顶级管理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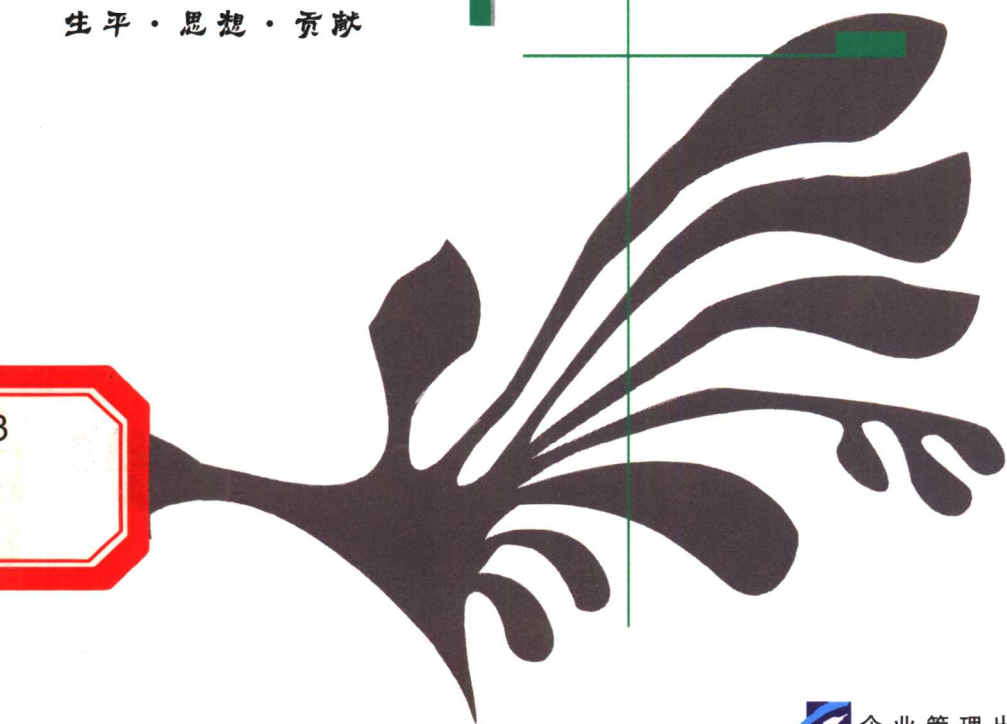
TOP

◎ 陈琳 编著

MANAGEMENT

SPECIALIST

生平·思想·贡献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90104949

点击世界顶级管理学家

陈琳 / 编著

企 业 管 理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击世界顶级管理学家 / 陈琳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3.1

ISBN 7-80147-825-8

I. 点... II. 陈... III. ①企业家—生平事迹—世界
②企业管理—经验—世界 IV. ① K815.38 ② F2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808 号

书 名: 点击世界顶级管理学家

作 者: 陈琳

责任编辑: 群翔

技术编辑: 穆子 晓光

书 号: ISBN 7-80147-825-8/F · 823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 100044

网 址: <http://www.cec-ceda.org.cn/cbs>

电 话: 出版部 68414643 发行部 68414644 编辑部 68428387

电子信箱: 80147@sina.com emph1979@yahoo.com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1章	彼得·德鲁克	
	——非凡的先知	1
第2章	切斯特·巴纳德	
	——成功的实践者	27
第3章	哈罗德·孔茨	
	——管理丛林的思考者	51
第4章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	
	——X与Y的思辨	75
第5章	赫尔伯特·西蒙	
	——决策理论大师	91
第6章	菲利普·科特勒	
	——营销之父	111
第7章	查尔斯·汉迪	
	——塑造未来非理性的时代	135
第8章	斯蒂芬·R·科维	
	——高效率的思想大师	165
第9章	亨利·明茨伯格	
	——挑战正统的流浪者	197

第10章	汤姆·彼得斯	
	——最富激情的管理变革传道先知	217
第11章	迈克尔·波特	
	——大视野的竞争战略家	243
第12章	约翰·科特	
	——用事实说话	261
第13章	彼得·圣吉	
	——在学习与发展	279

第 彼得·德鲁克

1

章

——非凡的先知

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1909年5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1934年作为经济学家和顾问在美国定居; 1942年任佛蒙特本宁顿大学哲学和政治学教授; 1952年任纽约大学管理学教授; 1974年发表《管理: 任务、责任和实践》; 1982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不可能的世界》。

名

人

名

言

“(经营管理理论的三个部分)首先是关于组织的外部环境的设想……其次是关于组织的特定使命的设想……第三个是关于完成组织使命所必须的核心竞争力的设想。”

“管理和创新是一体两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不懂得管理的企业家，不能存活很久；不懂得创新的管理者，也不会存活很久。”

——彼得·德鲁克

童年的战争

1909年5月13日，彼得·德鲁克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上流阶层家庭里，祖父生前是个银行家，当律师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政府经济部的高级公务员，母亲是个医科学生，这在当时的奥地利妇女中是非常少见的。彼得·德鲁克一家住在维也纳郊区一幢造型别致的房子里，这幢房子是由维也纳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为他们建造的。彼得·德鲁克站在自己第一间成人房间里，透过屋檐下折线形窗户，越过当地的葡萄园，他可以看到维也纳森林的山丘。

彼得·德鲁克依稀地记得，5岁时的一天，他当时正在父亲书房上面的儿童浴室里快活地洗澡，有三个男人的声音顺着热水管道传上来，钻进他的小耳朵里。第一个是父亲的声音，第二个是叔叔的，他是维也纳首屈一指的法学家，第三个声音是托马斯·马萨里克的，日后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彼得·德鲁克清楚地听到其中的一位说到：“这不光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当时正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

战争的炮火给彼得·德鲁克的童年带来了阴影，对他和朋友们来说，战争是这个世界永久的状态。“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想到战争终究会结束”，彼得·德鲁克回忆到，“事实上，与我年龄相仿的每一个男孩都知道，‘长大’就意味着‘我应征入伍并被送上前线的那一天’。”但是，战争却也为他的学习写作带来了好处，他和朋友们浏览带有粗黑边框的阵亡人员名单和讣告，从中寻找我们认识的名字——那些我们热爱和思念的人的名字，由此学会了认字。

事实上，彼得·德鲁克这代人是幸运的，他们是免遭劫难的。就连他自己也认识到他运气不错，因年龄小而不用去给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们当炮灰。他在《未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 (1959) 一书中写到：“我们这些逃过了那个年代特

有恐怖的人，我们这些从未遭受过整场战争、集中营或者警察暴行折磨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而且还应抱有一份宽恕和怜悯。”

独特的教育

富裕的家境和身为“上流阶层”职业人员的父母从小给了彼得·德鲁克极好的教育。“我父亲每个星期一都要举办宴会”，彼得·德鲁克说：“赴宴会的常常是经济学家，有身份的公务员，甚至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国际大律师。”在每个星期的后半周，彼得·德鲁克的母亲会举办一次医学宴会，还有音乐宴会（因为他的祖母是由古斯塔夫·马勒任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独奏演员）和文学宴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数学宴会。彼得·德鲁克说：“我的父母亲对数学和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在一次次的宴会上彼得·德鲁克耳濡目染，借助于萦绕在他周围的不同语言的高谈阔论，接触到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以及音乐等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知识，这对他日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场合还使他学到了一种悠闲从容的成熟风格，这种风格成为他作品中的显著特点。学识成为他跟读者共同分享的礼物，而不是自命不凡的资本。彼得·德鲁克夫妇培养出的是一名有知识的人，而不是一位学究。

在彼得·德鲁克的小伙伴中，也有很多有智慧的小朋友。他回忆说：“一天，我们在玩‘长大干什么？’的游戏。我们有的说当警察、有的说当消防队员，但古斯塔夫却说，‘我要做一名研究伊斯兰教的大学教授。’把我唬的目瞪口呆，因为我知道古斯塔夫会说到做到。”后来他的确成了芝加哥大学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

然而幼时彼得·德鲁克的书法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为了挽

救他的书法，他的父母把他从州立学校转到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他成了埃尔莎小姐和索菲小姐的得意门生。索菲小姐较为热情，她是一位教育改革者。她教男孩们烹调和缝纫，教女孩们使用榔头和锤子，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主张”，而这种做法也正是彼得·德鲁克家里的“规矩”。埃尔莎小姐身穿令人生畏的黑色细斜纹披风，这使她看起来像只“大甲壳虫”，加上夹鼻眼镜和长筒靴，她看起来是非常严厉的。不过，“……我们崇拜她”，彼得·德鲁克说：“50年之后，妇女解放运动者声称上帝其实是女的，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

埃尔莎小姐为彼得·德鲁克设计了一种学习方法，让彼得·德鲁克自己负责自己的学习。她给了他一个笔记本，让他每周开始时记下他想学的东西，然后在每周结束时对照预期目标来检查结果（看来“目标管理”来源于此）。到四年级时，彼得·德鲁克已经显示出当作家的潜力，他说：“我很早就知道，写作将是我可能干得出色的一件事——也许是惟一的一件事。”埃尔莎小姐发现了他这一优点，并为了加强这一优点让他每周写两篇作文，一篇由她命题，另一篇由彼得·德鲁克自定。通过这样的锻炼，埃尔莎小姐首先形成了这样一则信条，而这一信条正是50多年来彼得·德鲁克一直向高级经理人员传授的：要扬长避短。

虽然彼得·德鲁克没能在书法上有所提高，但是在其他方面倒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埃尔莎小姐敦促彼得·德鲁克父母让他跳过五年级，这样，彼得·德鲁克直接从四年级进入一所公立拉丁语高级中学学习。在8年枯燥的拉丁语学习中，有一位老师让他无法忘怀。彼得·德鲁克13岁时，有一位“循循善诱的宗教老师”给他上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人生课，他问每个学生他们想靠什么让人们记住自己。当然，学生们年纪太小，回答不出。于是他笑着说，“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回答得出。但是，假如你们活到50岁还答不上来的话，那你将已经虚度人生了。”从此以后，彼得·德鲁克一直力争按照这一存在主义的崇高人生法则去生

活。“我一直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这是一个能够促使你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因为它促使你把自己看做一个不同的人，看做你能成为的那种人。”

自立谋生

高级中学读完之后，彼得·德鲁克没有像父亲期望的那样，直接进大学，然后再读医学院。相反，他在汉堡当上了学徒工，这使他父亲颇感失望。彼得·德鲁克说：“在学校里我已经呆得足够长了。我要在成人堆中使自己成熟——我一向不喜欢年轻，讨厌跟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伍，我认为大多数的大学生就是那样。我要自己谋生，在经济上独立。”那时候，他才17岁。

在汉堡，彼得·德鲁克在一家把五金产品卖到印度的出口公司做实习职员。同时，为了取悦父亲，他说：“我进入汉堡大学法学系学习，但其实并不抱什么正经目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兼职学生。全日制的法学系学生其实并不会花上整整4年时间刻苦用功地学习法律。他们在轻轻松松、稀里糊涂之中消耗4年的时光，一大半时间花在喝啤酒上，还有一部分时间用于追花逐蝶。他觉得即使不做全日制学生，也不会落下这两种享受。但是大学里不设夜课，而他白天又要上班，在那个流浪式学习风行的年代，只要你注册上某门课，然后在学期末参加考试获得学分就行了。因此，在汉堡的整整一年半时间里，他一次课也没听过。但也就在同时，彼得·德鲁克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都到汉堡市立图书馆读书。整整15个月的时间，他除了看书还是看书。读的书有德语的、英语的和法语的。他每周上一次汉堡歌剧院，就在那里，他有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发现。在他看了威尔第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Falstaff)后，他为威尔第在80岁高龄写成这样一部精神激昂的作品而震惊。威尔第曾说：“在我作为音乐家的一生中，我一直在为追求完美而奋斗。但这个目标总是躲着我，所以我真切地感到一种责任，觉得应该再努力一次。”威尔第的话在彼得·德鲁克心

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8岁的他发誓：要以威尔第的这种精神投身于自己毕生的事业。后来，在他80岁之后，彼得·德鲁克完成了4部著作，可见他确实坚持了威尔第的精神。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当有人问我对自己哪本书最满意时，我微笑着说，‘下一本！’”

离开汉堡后，彼得·德鲁克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在一家华尔街公司当见习分析员，除继续学习法律之外，还学习了统计学。彼得·德鲁克对行情的分析预测相当准确而且常常令人惊异，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种对数据事实及其寓意深入洞察的本领。也是因此，使人觉得他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后成为金融记者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彼得·德鲁克在《法兰克福大众报》很快得到提升，在这里，他的新老板——埃里克·多姆布罗夫斯基——德国最出名的自由派编辑，是彼得·德鲁克遇到的第三位伟大的老师。多姆布罗夫斯基是讲究守时的普鲁士人，彼得·德鲁克第一天上班就因为早上6:10才到而受到他的严厉训斥。“我们早上6点上班，下午2:15等最后一稿送往报社之后才下班”，彼得·德鲁克说。于是，他就强迫自己利用下午和晚上这段时间用功，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社会和法律机构的发展历史、金融，等等。因为一个记者得写到许多话题，所以他尽可能地充实自己。多姆布罗夫斯基每年要召集两次这样的会议，对他的一小群部下在过去6个月中的工作进行回顾。哪些他们干得好？哪些他们已尽力做好？哪些他们还不够努力？然后对他们干得不好的方面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最后，展望今后的6个月，每位编辑人员都要讲出他应该注意和改进的方面，以及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也正像是埃尔莎小姐用过的方法。后来，彼得·德鲁克自己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每年夏天，他用两周的时间，对一年中的工作进行问答式反省。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对自己进行测评，这是“自我提高的最佳具体办法……坚持自我测评帮助我着重在我有发展潜力的方面下功夫，而从一事无成的方面脱身出来”。

法兰克福大学原来和汉堡大学一样，都有着闲适的学术气

氛。不过彼得·德鲁克还是从中挑选出了一门受益匪浅的课程：海事法。彼得·德鲁克认为这门课为他提供了管理法则的一个模式。海事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但老师在讲述海事法时是把它作为西方历史、社会、技术、法律思想和经济的一个缩影来讲的。彼得·德鲁克觉得这是 he 曾经接受过的涵盖面最广的课程教育。15年后，他借用海事法的模式来教授管理学。如同海事法一样，管理学显得专业性特别强。但是，彼得·德鲁克把它作为“人类价值和行为表现、社会秩序和知识追求的综合法则”来讲授，他认为管理学是“从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和哲学中汲取营养的学科。简而言之，管理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彼得·德鲁克不是德国公民，因此他没有资格参加国家考试，也就不能成为法学博士。于是，凭借临时抱佛脚的填鸭式复习，加上自己娴熟的应试技巧，他获得了意义不大的公共法和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根据彼得·德鲁克的说法，“读法律的一项收获，就是遇到了多丽丝——不过不是在听课时，我根本就没听过课，而是一次我代生病的国际法教授讲课时遇见她的。”多丽丝·施米茨是来自美因兹的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子，后来她成为彼得·德鲁克相守60年的妻子。

再见多丽丝

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街头出现了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党徒。彼得·德鲁克回忆道：“我周围的一切，社会、经济和政府——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正在崩溃。”彼得·德鲁克为了寻求解决时弊的良药，开始致力于研究三位曾各自在其动荡的时代里努力建立秩序的德国思想家，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但是不出彼得·德鲁克所料，纳粹对此无法容忍，小册子在希特勒上台两个月后随即便遭禁止，事实上是被烧毁了。彼得·德鲁克知道自己不久就可能被驱逐出境或关押起来，因此他决定离开德国。

在希特勒掌权的几年中，彼得·德鲁克开始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深入地分析。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经纪人的末日：论极权主义的根源》中，他从原始存在主义角度出发探究出法西斯主义精神和社会根源，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和恐怖性。彼得·德鲁克说道：“这是一本政治书，它具有一个政治目的：加强维护自由的愿望，与抛弃自由、制造独裁的威胁作斗争。”温斯顿·丘吉尔积极响应，他在1939年春为该书写了一篇赞扬性的书评——也是该书的第一篇书评。而且丘吉尔在1940年刚出任英国首相的时候，就下令把这本书收入英国候补军官学校每个毕业生的必备书目之列。

最终促使彼得·德鲁克离开德国的是大学中的一次由“纳粹委员”主持的教师大会。彼得·德鲁克满心希望这所德国最“自信的自由派”大学以自由精神著称的全体教师会捍卫知识自由，但是这次会议让他感到恶心得要命，于是，他在48小时之内离开了德国。

彼得·德鲁克搬到了举目无亲的伦敦，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证券分析师。日子简单而平淡，但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乘着自动扶梯从皮卡迪利广场的地铁站出站时，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久违了的多丽丝·施米兹正乘扶梯而下，两人交叉而过。彼得·德鲁克和多丽丝相互热烈地挥手致意。彼得·德鲁克到达扶梯顶后马上换乘下行扶梯，而多丽丝一到底也马上乘扶梯而上，他们再一次交叉而过。多丽丝当时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异地的再次相遇把两个人的心拉得很近，当他们终于从扶梯上下来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爱情生活就这样在伦敦开始了。

彼得·德鲁克在英国生活了4年，在这段生活插曲中，他每周都要乘火车南下到剑桥大学参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研讨会。在正式受教于这位大师后，他突然领悟到：凯恩斯和他的那些经济学学生，个个都只对商品的行为感兴趣，而令他感兴趣的却是人的行为。他对人的兴趣引导着他进行管理研究。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是完全与人相关的。这一兴趣也将把他引入管理咨



询的职业之路。

1937年1月，彼得·德鲁克和多丽丝缔结百年之好。婚后不久，他们便双双前往美国，追求新的、面向未来的生活。

“写作是我的一切”

彼得·德鲁克在82岁时写到：“从我20岁那年起，写作就一直是我所从事的，如教书和咨询等一切活动的基础。”在他6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彼得·德鲁克出版了29本书，平均每两年出一本。他的全部作品分成三类：社会和政治分析著作，如《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年)和《断层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1969年)；管理理论著作，如《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1954年)和《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1974年)；以及为经理们提供实践指导的著作：如《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 1964年)和《卓有成效的高层经理》(The Effective Executive, 1966年)。此外，汇编成集的论文集，如《管理前沿》(The Frontiers of Management, 1986年)和《生态学视角》(The Ecological Vision, 1993年)等。多年来，彼得·德鲁克写书之余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从1975年到1995年，他每月为《华尔街日报》评论版撰写专栏文章，其中不乏被广为引用之作。在同一时期内——他自称为“产量最高时期”——他共写了22篇长篇文章，每篇3500至6500字不等。其中，8篇为《哈佛商业评论》而写，3篇为《公共利益》而写，3篇写给《大西洋月刊》，2篇写给《外交事务》，2篇写给《经济学家》，还为《新视角》、《福布斯》和《老爷》各写了1篇。他把自己50多年来写成的最得意的文章收录在《生态学视角》一书中。他还将20年来所写的文章，汇编成3卷论文集。用他的话来讲，这3卷论文集是“计划之中”的，因为，在他着手写第一篇论文时，他已经为论文集选定了主题。他还写了2部

小说、3本管理学专著和4本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论著，其中包括《彼得·德鲁克看亚洲》(Drucker on Asia)一书，该书原先是针对日本市场而写的，1997年用英文出版。现在，此书正被翻译成韩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泰语等多种版本。

这上百万元的文字，都是他在坐落于加州克莱蒙特市的书房内写就的。他的书房位于市郊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但这种牧场式的房子非常通风和舒适。他使用电动打印机，“我不用文字处理器，因为它会使我写得太冗长”，他说。彼得·德鲁克写的东西可以说是针对几乎来自五湖四海的专业人员、经理和受过普及教育的人，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至少25种语言。

除了写作，彼得·德鲁克还开设讲座，提供咨询服务以及给研究生院上课。他说：“我比较愿意给具有管理学经验的学生上课。”多年以前，彼得·德鲁克拒绝到哈佛商学院任教，因为当时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清一色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没有大量实际经历的学生从我这儿学不到什么”，他说，“因为，我从他们那儿也学不到什么。”

正因为彼得·德鲁克是个高产作家，还有众多的社会工作，他始终都是牢牢地掌握时间的人。如果你写信问他是否可以为你们公司讲一次课，或者为你的杂志写一篇书评，从不使用秘书的彼得·德鲁克回寄给你一张明信片，背后印上这样一段简练干脆的话：

彼得·德鲁克先生对您的盛情不胜感激，然恕本人对以下诸事不能效力：投稿或作序；稿评或书评；讨论或座谈；加入任何委员会或董事会；填写调查表；接受采访；以及在电视台或电视上抛头露面等。

成功的企业组织

彼得·德鲁克作为管理学专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1942年他接受了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开始了对通用汽车公司18个月的调查研究。调查期间，33岁的彼得·德鲁克是完全自由的，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研究这个世界第一号的制造业巨头。对彼得·德鲁克日后著书论述通用汽车公司的经营策略和企业本质，通用汽车公司也未加任何干涉与限制。通用汽车公司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P·斯隆曾对彼得·德鲁克说：“我不会告诉你该写什么，研究什么或者得出什么结论……我对你的惟一指示是：记下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不必担心我们的反应。”18个月的调查结束后，彼得·德鲁克完成了他划时代的著作《公司的概念》。

彼得·德鲁克希望从特殊案例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是因为阿尔弗雷德·P·斯隆，通用汽车公司就显得过于特殊了。斯隆是个苦行僧似的管理者，他为了通用汽车公司而活，实际上他就住在公司里，他没有子女，专注于工作。斯隆领导的这个公司与他的个性和行事方式是分不开的。但是事实上彼得·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得到的许多经验教训都是斯隆个人教给他的，而不是从公司里学来的。

斯隆教给彼得·德鲁克的首先是有关分权的内容。彼得·德鲁克认为“在20多年的工作中……阿尔弗雷德·P·斯隆先生已经把分权的概念发展为一套产业管理哲学和一个局部自治体系。”他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技巧，还是对社会秩序的概括。”分权结构对通用汽车公司高级经理们产生的影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充分地实现了他的分权概念，并从中获得了全部行为模式和成功解决经济生活中最困难的具体问题的基础”。

彼得·德鲁克十分反对通用汽车公司对待员工的态度，他从